

乡村生态场域在中国文学经典中的生成与变迁

张琴凤* · 朱凌**

目 录

1. "乡村生态"的概念
2. 被介入的乡村生态——迁徙体验与经典文本的初步想象
 - 1) 主动的迁徙
 - 2) 被动的迁徙
3. 被延续的乡村生态——“家园”寻梦与经典文本的快速生成
 - 1) “诗意家园”的书写
 - 2) “文化家园”的想象
4. 被拓展的乡村生态——生命想象与经典文本多样化的变迁
 - 1) 生命想象中经典文本的多样化叙述
 - 2) “乡村生态”经典文本的新体验
 - 3) 经典文本中“乡村”原生态的退却
5. 结语

1. "乡村生态"的概念

在文學領域，“鄉土”与“鄉村”¹⁾稱謂不同，蘊含的社會文化和歷史內容不同，

* 中国山东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

** 中国山东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1) “乡土”和“乡村”都是某一特定语义范畴的描述。“乡土”一般是作家对故乡(包括出生地意义或精神指涉与情感认同意义上的故乡)进行有距离(包括空间距离、时间距离以及心理距离)观照的产物；“空间位移”和“时序错置”使作家产生一种显在的动情观照，它常表现为“乡愁”的显现，显露出比较明显的特定地域风貌。“乡村”作为一个实际的地理环境概念，是指乡里村庄、农村等，它往往与“城市”对举，即“城与乡”（此处的“乡”显然是“乡村”之“乡”而非“乡土”之“乡”）。它们分别指涉两种基本的、互有差异的经济形态、文化形态、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等。它们的共同点是关注土地，具有乡间的泥土气息。

它們呈現出來的“生態”也不同。在“鄉村生態”²⁾這一場域演變進程中，文學經典文本受到文化、政治、歷史因素多方面的影響。所謂鄉村生態，廣義的釋義既包括鄉土生態維系的根本——自然生態空間，即生態意義中的鄉村；也包含着鄉村生態中的生活經驗、生命體驗、社會關係、人文景觀等形成的文化結構以及鄉村悠久的歷史和鄉約禮俗規範下的“小傳統”。基于鄉村生態蘊含的複雜文化精神和多元化的文化語義，僅僅將其定義為自然生命的生存空間和生存環境過於簡單。實際上，作為現實生態所表達的“鄉”是與“城”對舉的，它們分別指涉兩種基本的，互有差異的經濟、文化、生活狀態以及社會組織結構共生的生命（生活）形態。作家們在面對所描述的對象時，往往因為其視野不同、立場不同、世界觀不同導致了心境、趣味以及藝術見解、藝術表現手法的不同。因此，鄉村生態不只是一个空間的概念，³⁾它是在漫長的生命形態發展過程中滋生的對鄉土世界的全面的生存狀態的呈現。文學領域中審美與閱讀是在鄉村生態語境中同步生成的，人們關於文學“經典”的想象也建立在鄉村生態的變遷與演進進程中。作為空間的想象或想象的空間，鄉村作為一個大環境形成的生態場域給予作家最基本的創作狀態和想象的源泉，在這裡滋生著文學生成經典的可能性和無限的想象力。想象產生於想象之外，想象不是自我生成的，而是需要

2) 界定“乡村生态”的概念，需了解乡村指涉的概念和文化内涵。乡村在《汉语大辞典》的释义：“今亦泛指乡村。”艾青《献给乡村的诗》：“我想起乡村田野上的道路——用卵石或石板铺的曲折狭窄的道路。”《汉语辞海》亦作“乡邨”。1.村庄。2.今亦泛指农村。3.乡里家乡。关于“生态”在《汉语大辞典》中有三种解释：“1.显露美好的姿态。2.生动的意志。3.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笔者认为文学中的“乡村生态”是指生活在乡村世界中的人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即文学世界中呈现出来的乡村生活图景。

3) 如果说“乡土”与“农村”的指称，有着“现代”和“当代”的时间划分，有着情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不同表达，那么“乡村”则不存在时代或情感意义的指涉区分。乡村作为对“乡下”、“村庄”等概念的描述，既不包括政治统摄，也不存在情感浸染，它是对一定地域下人的生存（生活）状态的描述，对生存着的人的情感传达等。首先，“乡村”可以作为“怀念与追忆”以及“融入”的对象。因为一种精神的贯注和理念的统摄，乡村的所指由形而下的某一地理（域）指称成为观照者精神状态的表达或灵魂寄托，即人的精神家园或精神状态。这是一种“乡村生态”，包含着当时的文化、政治、风俗礼仪对人的思想意识的影响或历练。其次，“乡村生态”有其自身的原始生态力和生态特征，乡村人也有其固有的生存状态，这类“乡村生态”的表达是关于人性（人的本性）和人的生存状态的抒写。

外部环境的刺激。空間轉移和時序交錯下，產生了新的生存狀態，成為對“鄉村”想象的新契機，也使文學“經典”最終形成成為可能。

2. 被介入的乡村生态——迁徙体验与经典文本的初步想象

作家對鄉村生態的想象孕育在他“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上，對“鄉村生態”帶來的記憶滲透以及離開鄉村的遷徙體驗構成了一種經典文本。

1) 主动的迁徙

中國新文學自誕生之日起，便致力於“平民文學”和“人的文學”的建設。走出傳統文學的狹障，融入社會大眾成為新文學矢志不渝的目標。農民作為社會大眾的一員自然與其相遇，鄉村作為農民生存的重要生態場域也成為描述的對象。此後近一個世紀的新文學發展進程中，鄉村生態圖景成為新文學最重要的文學場景和文學形象之一，鄉村生態小說成為新文學作品中最具經典性的創作題材之一。于是在鄉村生命形態的想象中孕育着文學作品的魅力被凸顯的可能性。新文學作家絕大多數來自于“鄉村”，他們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在鄉村生活中烙印下了或美好或慘淡的印記。將這些記憶融入新文學，被呈現出來的是作家們離別鄉土，融于城市的的遷徙體驗，和以這種體驗回望鄉村生態而產生的融入性嘗試。因此，鄉村生態作為生存想象的場域被凸顯于各類文字中，經典文本也最終由此生成。這類文字多是基于記憶中的“鄉村”，呈現出來的鄉土既包含宗法制自然村社和陳舊保守的禮制風俗，還有對理想化鄉土世界的想象性構建。沈從文在對鄉村記憶的想象中營造了一個優美淳樸、具有鮮活生命氣息的理想化“湘西世界”，呈現了作家印象中的“鄉村生態”。他受魯迅開創的“五四”現代鄉土文學的影響，努力搜尋關於“湘西世界”的記憶，將湘西的自然風情和個人情感毫無保留地呈現出來。小說《夜漁》描述了湘西人夜晚設網捕魚的景象，令人

心馳神往；《市集》中則描繪了湘西農民趕集時一幅幅生動的畫面；《獵野豬的故事》生動地展示了湘西農民合作上山追獵野豬的有趣情境。沈從文筆下的“湘西生活”總是充滿意趣，并滿懷欣然的，作為與大城市生活的對比體驗，沈從文對“鄉村”的回顧總是帶有更深切的依戀和膜拜。《月下小景》中，那醉人的黃昏——“當這松杉挺茂嘉樹四合的山寨，以及寨前大地平原，整個為黃昏占領了以後，從山頭那個青石碉堡向下望去，月光淡淡的洒滿了各處，如一首富于光色和諧雅麗的詩歌”。⁴⁾ 自然環境帶有“湘西世界”最顯著的地域特征，沈從文對自然景致的描述使“湘西世界”的形象更立體，更生動，其湘西小說充滿濃郁的地域風情。沈從文關於“湘西世界”的書寫向我們展開了一幅生動完整的鄉村社會生活畫卷，呈現了他所建構的供奉人性的“希臘小廟”。總之，無論是《邊城》中靜謐安詳的擺渡時光，還是《長河》中“鄉下人”的本色朴實，或是《阿黑小史》彰顯的生命的野性和力度，都是作家對故鄉（包括出生地意義或精神指涉與情感認同意義上的故鄉）進行的有距離（包括空間距離、時間距離以及心理距離）的觀照。

在這里，遷徙是一種生命的形式，也是對30、40年代社會動蕩現實的呈現，我們可以看到鄉村生態中需要被啓蒙的蒙昧狀態或者田園牧歌式的挽歌式眷戀。這類小說往往凸顯出一種更為明顯的社會歷史內涵甚至是政治意識形態動機，而真正描寫鄉村生態的經典文本未必就此展開，生動鮮活的鄉村生活場景也鮮見于文字。作品表現出來的多是遷徙狀態下與鄉村世界的疏離與感傷，以及“空間位移”和“時間錯置”使作家產生異置于“鄉村生態”的生命體驗。這部分作品實際上是游離于鄉村生態視閥之外的，它們之所以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或鄉村文學史中不可回避的“經典”作品，是源于它們與時代話語契合的精神氣質。

2) 被動的遷徙

中國新文學產生與發展的近一個世紀，正值中國革命進行與成功的歷史進程

4) 沈從文：《月下小景》，長沙：岳麓書社，2005，第54頁。

和對鄉村生活的切實體驗和熟知成就了這一點。作家對“十七年”的鄉村世界的描述雖然帶有較強的政治主導性，並不是完全的鄉村自主呈現，但由於作家們對鄉村生活的熟悉與深入和對鄉村人民生活的關切情感，它總是以對鄉村生活的演繹為主來進行敘述，尤其是它呈現出的鄉村生活的某種自在和自然的狀態，展現出農民的許多真實生活場景和純真性情，反映出其平等的鄉村文化書寫態度，具有一定的社會文化意義。“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反映了當時農村許多現實問題，比如農民出路問題，鄉村管理和倫理秩序問題，鄉村法治問題等，這些確實是鄉村發展的重要命題，在今天仍然有針對性的現實意義。從這個角度來說，“十七年”鄉村生態寫作對新文學經典的生成具有重要的轉向意義。因此，“十七年”鄉村生態文本展示的意義不在於成就經典文本本身，而在於它創造了鄉村生態文學的寫實風格，改變了新文學經典文本的創作格局。在此，“鄉村”不再是一個遷徙的意象，而是現實的存在。

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掀起高潮，這種強烈的烏托邦式的沖動達到了想象中中國鄉村的極致。正如李準在《李双双小傳》中熱情謳歌的李双双式的“公而忘私”、“為集體而忘個人”的共產主義風格；王汶石在《新結識的伙伴》中描寫的大辦食堂、大煉鋼鐵、畝產放衛星等情節，多與當時的“共產風”、“浮夸風”相關聯，在這裡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生態圖景得到極致呈現。鄉村生態此時表現的是由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層層推進的一體化程度越來越高的政治組織形式。思想鬥爭、路線鬥爭和階級鬥爭的觀念被徹底貫徹，同時一個左右了幾代讀者的閱讀習慣和思維方式得以延續，並由此誕生了關於中國鄉村的“想象性構成物”——“農村”。這種新生成的生態模式很自然地把“鄉土”擠到一邊，或成為陪襯“農村”的背景（《創業史》），或成為新的鄉村生態的“點綴”（《山鄉巨變》），或直接變成政治隱喻（《艷陽天》）。“鄉村生態”一步步成為印刻在題板上的政治意象，失去了鮮活的生命力。“當用‘農村題材’來替換‘鄉村小說’時，人與鄉村或土地的情感關係就要被轉換成為政治抒情，它們被一種更為‘重要’的宏大敘事所遮蔽。”⁶⁾因此，此時被政治任務介入的被動遷徙所帶來的鄉村生態

6) 薩支山：《試論50至70年代“農村題材”長篇小說——以〈三灣〉、〈山鄉巨變〉、〈創業史〉為

世界還沒有達到深刻和全面的高度，甚至還存在着一定的遮蔽和局限。比如在鄉村生態的描繪上存在着較局促和狹窄的缺陷，對鄉村社會生存現狀并未完全呈現；期間鄉村的宗教信仰、歷史變遷、文化傳統等鮮有被涉及，民俗風情也表現得相當單調，毫無特色；在對農民形象的塑造中對個人生活場景和人物心理活動也關注較少，人物性格不夠丰满。“十七年”的鄉村生態世界是一個時代的產物，也因契合於這個時代的精神而閃亮於文壇。很多評論者曾質疑其“經典性”或認為它們是特定語境下生成的“怪胎”。但不可否認，這個時代的作家們也曾聚焦於“鄉村”，積極地從鄉村生態中發掘或找尋時代的生命特征。鄉村不僅僅描繪雋美和諧的田園風光，也不只是簡單的階級鬥爭場所，它記敘着平凡質樸的鄉村日常生活，表現出單一的農業生產方式帶來的生活的簡潔和質樸，它包含着苦難和沉重，也享有自己的愉悅與輕鬆。“十七年”鄉村文學描繪的鄉村生活狀態并非全面，但卻包含着鄉村生活另一面的真實。在時代語境中對鄉村生態世界的書寫已成為經典文本初步構建的獨特嘗試性體驗。

3. 被延續的鄉村生態——“家園”尋夢與經典文本的快速生成

20世紀80年代，新的現代性工程重新啟動，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和中國農村生活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全球化已成為一個基本的語境，知識界對民族身份認同的焦慮感，導致了對鄉土的顧眷。隨着全球化的過程，中國知識界出現了對‘中華性’逐步失落的憂思；為了對抗西方殖民化，在一些作家那里，‘鄉土’不知不覺地轉化成為‘本土’的象徵，顯然，故鄉、大地、母親、根等意象之間的隱喻關係源於農業文明的修辭系統。一旦民族的文化傳統遭受侵犯，這種修辭系統將為民族認同提供響亮而獨特的符號代碼，於是對‘東方文化’、‘本土文化’的‘創造性轉換’策略進入作家的視野，用中國鄉土對抗西方文明會成為一些作家的書寫方式。”⁷⁾作家們以知識精英的身份關注着現實的鄉村世界，熱忱地描

中心》，《文學評論》，03期，2001，第120頁。

7) 樂黛雲：〈“鄉土文學”研究的新收穫〉，《中國現代文學叢刊》，02期，1987，第240頁。

寫自己熟悉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們。此時，“鄉村生態”依然體現着鄉村的誠摯與純淨，也記着農民的心靈嬗變。80年代，作家們脫離了文化趨同的政治語境決定論，逐漸開始發現文學自在的審美詩性品格，營造具有審美獨立品格的個性化世界，於是，丰富多彩的鄉村生態世界便呈現於眼前。這時期的文學創作環境已變得相對寬鬆自由，當作家們表現鄉村改革場景和日常生活形態時，個人的價值觀和對生命形態的思索以及對文化心態的折射，也更加細致真實。這些小說是人們心中對理想和希望的詩意憧憬，也是對改革和生命現狀的真實描摹。因此，這個時期的鄉村生態文本繼續了“啓蒙”的主題和“革命歷史主義”的風格，成爲該時期具有代表意義的經典作品。

1) “詩意家園”的書寫

上世紀80年代初，張炜、賈平凹等一批作家帶着他們對鄉村詩意觀照的產物，如《聲音》、《一潭清水》、《滿月兒》等登上文壇。他們多爲下鄉知青，在走進鄉村的歲月里，他們播撒了自己的青春、熱情和汗水。十餘年後，他們以追憶的眼光重新審視心靈中的“鄉村生態”體驗。有些作家着力渲染鄉村的自在之美，創造性地表現了“鄉村生態”中生命與自然的和諧情景，形成一種色彩明朗、格調清新的牧歌情韻，表現了內在的浪漫主義審美情懷。汪曾祺筆下的一系列描繪蘇北高郵鄉村的風俗民情小說以其清新淳樸的鄉村文化生態圖景呈現於我們眼前。《受戒》中小和尚美好的愛情憧憬，葦葦庵中的和尚“吃烟，聚賭，殺生，飲酒，娶妻，談情”的世俗化生活；大淖街上“錫匠自發的頂香請願”等；汪曾祺爲我們呈現了溫情淳樸，富有詩意的“鄉村生態”圖景。他認爲“風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抒情詩”⁸⁾，因此，他筆下的鄉村生態帶有濃郁的“詩情畫意”。這個時期的鄉村生態已經基本擺脫遷徙帶來的漂泊的不穩定性，進入了縱深方向的鄉村生態書寫階段——即高揚起文化的大旗，以此來觀照、把握當代農民、農村生活形態爲適應時代而不斷蛻變的民族性格和傳統心理。

8) 汪曾祺：〈大淖紀事是怎樣寫出來的〉，《讀書》，08期，1982，第54頁。

与此類似的還有阿城的《遍地風流》，何立偉的《小城故事》、《白色鳥》、《一夕三逝》等。阿城的“三王”系列，在展現人物、環境和意象、情節的過程中體現出“天人合一”的境界，表現了寫意的整體色調，呈現了靜穆、和諧、超脫的富有濃郁文化氣息的“鄉村生態”。上述小說延續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作家們對自己“故鄉”詩意敘述的文學傳統。沈從文筆下的“邊城”世界以詩意和諧的人際關係象征了我們民族過去的美好桃花源理想，作者于字里行間中流露出其潛意識里存在的詩意性情。在這個“向后看”的烏托邦里，沈從文書寫的是他三十年前的一个夢，他以一个美麗憂傷的“愛情故事”為支點，撐起了他關於重塑民族精魂的創作初心。與30年代的鄉村詩意敘述相比，80年代的鄉村詩意書寫更注重作家心靈的表達和敘說，延續了知識分子的“啟蒙”精神和文化探尋的責任意識。而此時的鄉村生態是意象化的表達，並不是真正現實的鄉村形態。它們關注的焦點集中于“文革”之後文化精神領域存在的問題，而不是對鄉村人自在生活的寫實，即重在寫意而非寫實。此時，鄉村生態成爲一種意象化的浪漫抒寫，而非鄉村生態的真實生命形態。這種聲音正是80年代“尋根”文化潮流所熱衷的表達方式，成爲當時文化經典生成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時期以來，當代作家以一種文化和社會的視角觀照鄉村，由此出現了一批以地域文化爲特征的鄉土小說。如賈平凹的“商州系列”、鄭萬隆的“異鄉異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等。這部分小說延續了“五四”時期鄉土小說的傳統，再現了鄉村的地域文化特征和風土人情。新時期鄉村小說創作是對“鄉村”詩意觀照的結果，筆力集中于書寫特定地域的詩意生存，淡化自然村社的社會歷史背景，在寫實中包含着浪漫主義的氣質。對“故土”的記憶書寫因作者情感的介入，經由詩意觀照的自然村社往往變成了一種空間預設——一種烏托邦式的想像存在。而又因確定的時間因素的介入，作爲反烏托邦力量的理性思維又不自覺地規約着作家在創作中展開關於烏托邦建構與解構的對話。與沈從文一樣賈平凹也是個生活在城里的“鄉下人”，“商州世界”的建構同樣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發源地。在此，沈從文與湘西、賈平凹與商州，已經不可分割地聯結在一起。賈平凹對故鄉商州始于“初泉”，繼而“又泉”，後又“再泉”，成爲“商州三

泉”，從而鮮活的商州生活被呈現于世人面前。商州“初泉”和“再泉”是介于散文和小說之間的文体結構，而“又泉”則是純散文，這是作者對文体的一種自然選擇。“商州三泉”是作者一次次返鄉觀感的記泉和體驗，同時也是離開故鄉之后的再次回鄉和對故土的怀念感恩。賈平凹認為通過對“商州”的書寫達到介紹、回報故鄉的目的，“多多少少為生我養我的商州盡些力量，也算對得起這塊美麗、富饒而充滿着野情野味的神秘的地方，和這塊地方的勤勞、勇敢而又多情的父老兄弟了”⁹⁾。書寫故鄉的理想無形之中確立了作者帶有詩意的觀照視角，同時這種鄉土情感的書寫也或隱或顯地保留于賈平凹其它有關商州敘述的文本之中。對此，“商州世界”的詩意化書寫已成爲賈平凹以鄉土想象的方式進行的烏托邦建构。

以唯美的筆觸張揚自在人性的審美情怀在塑造鄉村生態世界的過程中悄然滋生，而文化覺醒不僅隱逸在詩情畫卷中，更顯現在鄉村生活中。鄉村文學的生命在于還原具有現實詩意的本色鄉村生活，對鄉村生活精確而深刻的寫實性表達是經典文本的生成不可或缺的。于是，關於“鄉村生態”的書寫由對歷史風俗的描繪轉向了現實風俗的刻畫，由浪漫色彩的理想化詩意轉向原生態的寫實詩意。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周克芹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等作品通過真實的鄉村生活場景呈現了變革的鄉村中農民的生活軌迹、心理狀態和命運變遷。古華的《芙蓉鎮》也是以“寓政治風云于民俗風情圖畫，借人物命運演鄉鎮生活變遷”的視角，“唱一曲巖峻的鄉村牧歌”¹⁰⁾。作家對“農民中蘊藉的文化意識”，“運用現代的批判眼光，運用現代的理性進行過濾、鑒別”¹¹⁾。這是當代知識分子對鄉村生態重新審視的目光，正是這種現實理性的審美態度和文化精神生成了屬於当下的文學經典。

9) 賈平凹：《賈平凹文集·第3卷》，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第10頁。

10) 古華：《芙蓉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2頁。

11) 陳繼會：《中國鄉土小說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第399頁。

2) “文化家园” 的想象

鄉村的清新之美是自然的，同時也是外在審美的體驗。內蘊于其心底的對中國鄉村現實的透徹知解，有的作家開始反思由“鄉村生態”孕育生成的人性、生存、理想等人生狀態，探尋其文化精神。作家們對鄉村的書寫由“歷史文化層面進入了多維文化層面，從現實感受進入神話情境，從文化批判的主題進入了文化堅守的主題，立場與策略發生了明顯的轉化”¹²⁾。與汪曾祺等作家展現的鄉村世界不同，莫言選擇了“高密東北鄉”作為民間文化審美的鄉土世界，以奔放、自由、張揚的感覺書寫生命與死亡的意象，還原彪悍質樸的鄉村生態，頌揚生命意志的本能抗爭。在這里，以中國民間的“酒神”文化精神為代表的中國鄉村的原始生命本色得到了極大張揚。這一時期的賈平凹、張炜等作家也致力於對鄉村生態文化場景的還原和描繪，但他們逐漸從那種具有朴素詩意的鄉土田園生活里跨出，以另一種審視批判的現實主義目光書寫鄉村文化在封閉自足中產生的狹隘和愚昧。在中國現代文學詩意化的鄉村敘述傳統中一直蘊含着對鄉村文化形態的審視和批判。從三十年代的沈從文到八十年代的賈平凹，他們都認為詩意鄉村並非是一種恒定不變的審美形態，他們在建構鄉村烏托邦的同時也對鄉村自身的封閉保守進行批判，並對其未來發展命運產生憂懼。因此他們暫別了對鄉村的詩化、寫意化敘述，而呈現出重建鄉村秩序的結構性想象。沈從文的《長河》表達了自足的鄉村世界面對外來異質性因素所產生的真實焦慮。賈平凹的《浮躁》以“時代心態的代表”——金狗，在州河上辦河運——到州城報社干記者——回到州河發展河運的個人奮鬥史，揭示出急劇的社會變革帶給農民的曲折痛苦的心靈裂變和西方現代文明所引起的農民文化意識的覺醒，以及由此產生的煎熬于其中的共同文化心態——“浮躁”。張炜的《古船》則豎立起民族心史的一塊厚重碑石，講述隋抱朴奔絕現實——閉門思過——決然奮起的心路歷程，反映了洼狸鎮由土改、文革到農村改革大潮到來的40年歷史興

12) 張清華：〈野地神話與家園之夢——論張炜近作的農業文化策略〉，《小說評論》，03期，1994，第27頁。

衰。80年代后期，作家們開始嘗試書寫關於“鄉土世界”的寓言¹³⁾。這些作家無論是否打出“系列”的旗号，他們都在追求具有人生寓言意味的中國鄉土系列小說寫作的經典化范式。¹⁴⁾從文學史發展動態來看，受到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以來人文精神失落現象和社會轉型時期原有價值判斷失范的影響，文學關於“文化家園”的想象應時而生，這催生了文學中家園主題的建构与書寫。從這種意義上說，鄉村家園想象是當代中國人尋找文化家園的精神指向在文學領域里的具体表現。賈平凹、莫言、張炜、張承志、李銳、鄭義等作家對鄉村家園的文化想象從總體上看有種不斷虛化和理念化的傾向。比如張炜的“葡萄園”、鄭義的“老井”等鄉村文化意象表達了村史即中國農村之縮影的內涵。隨着“尋根”視角從“政治-社會”轉向“文化-社會”，其對文化之根的探尋歷程日益遠离城市，而走向更邊遠的“遠村”，這超出了時代和文化的邊緣，其中的“遠”不僅是地域之遠，也是“心灵之遠”。一類是張承志以一種純粹的精神理念來回望黃土高原時，那貧瘠的土地變得純粹精神化，成爲一種純然的心灵處所；一類是遠离嘈雜的城市“現代之音”的山野村庄。¹⁵⁾總之，作爲觀照對象的“鄉村”已經被符号化、淡化、虛化了。

“經典”包含着可閱讀的持久性，對鄉村生態的書寫之所以保持着持續的感染力，正是由於對“鄉村生態”中蘊含的文化積淀的挖掘和反思契合了時代話語的表達。在詩意渲染下，顯現的是幾十年鄉村的歷史變遷和鄉村生態孕育的人性本真。面對剛剛解除束縛，極力張揚“人性”的時代，“在升華人的精神品格的基礎上，重新理解包括馬恩在內的人類先哲們所提出的人生理想，所勾畫的人生遠景這樣的文化、哲學、歷史的有價值的命題。”¹⁶⁾“鄉村生態”于變革中孕育着激情，在文化大碰撞的時代，“鄉村生態”也受到不同層面的沖擊，發生着變革。於是經典文本也在大眾視野中不斷生成和轉化，形成了80、90年代“鄉村生

13) 这类乡土寓言主要有李锐的“厚土”系列中“乡土寓言的书写”；阎连科的“后乡土”小说，如《年月日》、《日光流年》、《耙耨天歌》、《丁庄梦》、《风雅颂》等。

14) 肖繁：〈真实的可能与狂想的虚假〉，《南方文坛》，02期，2005，第43页。

15) 比如吴增若的蔡庄、郑义的扬庄、王安忆的小鲍庄、李锐的吕梁山、韩少功的鸡头寨……

16) 汪名凡：《中国当代小说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第416页。

態”的多样化格局。

4. 被拓展的乡村生态——生命想象与经典文本多样化的变迁

80年代的社會變革使鄉村生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90年代的商品化大潮對鄉村生態形成了巨大的沖擊。80年代初期作家筆下的鄉村保留着原生態的鄉土詩意、淳樸鄉情以及厚重的鄉音。隨着全球化語境的到來，作家對民族身份被認同的期待心理，使他們關注的“鄉土”被充分突顯，鄉土成爲本土化生命“家園”的象徵。其中，土地、家鄉、母親、根等意象主要源于對鄉土文化的生命探源與修辭表達。因此，“鄉村”在其間成爲一種能指的形而上的文化意象空間。80年代以來，“尋根”作家的“啓蒙”并未延續“五四”啓蒙對傳統文化的否定，而是重拾傳統“鄉土”文化資源，開始了尋找精神家園的“鄉土”追尋。90年代的鄉村生態更具多樣性，具有豐富的生命意識。90年代文學經典的多元化使文學擺脫了50-70年代狂歡式的政治崇拜，經典的選擇和確立有了較大的自由度。“文化經典以一種快餐的形式供人消費，成爲消費社會打發時光、填補空虛的一種形式，對文學經典的那種虔誠和仰視成爲一種過去式。”¹⁷⁾在此基礎上，鄉村生態的多元化表達促生了多樣的經典化文本。

1) 生命想象中经典文本的多样化叙述

90年代隨着工業化、城市化的迅速發展，寧靜古樸的鄉村世界再也按捺不住躁動和焦灼的脈搏，老一輩的傳統生活方式已經不被年輕一代接受，他們迫切希望尋求鄉村變革與發展的新的可能。鄉土意識此時不僅是對土地的依戀和對故鄉的深情，更是作爲與現代城市相對立的一種精神資源而存在。90年代鄉村生態最爲顯著的變化是鄉村改革進入到更深的階段。如果說80年代的鄉村文化

17) 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4期，2003，第88页。

只是表現對改革的初步憧憬和設想，那么90年代以後，中國鄉村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鄉村倫理道德逐漸消失，農業經驗分裂，中國鄉村生態傳統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土崩瓦解，出現了“破碎感”。90年代以來，伴隨着改革的不斷深入，作者對鄉村的書寫將目光投向了當代鄉村經濟、政治建設的現實困境。90年代書寫鄉村政權關係的代表作家有譚文峰、閻連科、何申、關仁山、王祥夫等。王祥夫的《早春》描述的是真實發生過的重大社會事件——即假種子坑農事件。王祥夫以事件爆發之後讓普通農民來擔負罪名，顯示鄉村權力運行的不公。關仁山的《太極地》、《裸岸》等小說批判經濟行為成為干部謀求政績和仕途發展重要標準的體制弊端。從《九月還鄉》、《天壤》到長篇小說《天高地厚》，關仁山主要抨擊不穩定的土地政策和政治腐敗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制約。劉醒龍《分享艱難》聚焦於名為西河鎮的小地方，各種危機矛盾在這里上演，比如書記與鎮長之間的權力角逐，一觸即發的經濟危機，政府與公安部門的利益之爭，黨委、政府同企業家之間的相互依存與不斷摩擦，猝不及防的自然災害，隨時可能發生的“民變”因素……，這一切折射出90年代矛盾叢雜的鄉村百態。

這些作品主要表現了市場經濟對鄉村生態的強烈震動以及農民命運的沉浮和他們的心理變遷，其中的鄉村生存狀態更接近當下現實，作家關注的對象是當代農民的生存現狀和生命的發展狀態，這更為大眾接受，引起共鳴，成為90年代現實主義的創作典範。但是，隨着改革的不斷深化，“現實主義沖擊波”的作品缺乏冷靜細致地客觀解讀，大多仍延續改革初期“問題”小說的模式，在對文化的期待和守望中找到問題，却无法進行真正的鄉村文化秩序重建。這時期的鄉村生態小說應該“在變化太快的現實面前，提醒時代關注，除了生存的舒適度外，還應該有更為緊要的人格強度和生命力度”。¹⁸⁾

90年代對農民生命價值和生存狀態關注的現實主義小說不僅包含着現實的沖擊之力，也開掘着鄉村固守的文化積淀力量。鐵凝的《孕婦和牛》中一位步態

18) 周新民、劉醒龍：〈和諧：當代文學的精神再造——劉醒龍訪談錄〉，《小說評論》，01期，2007，第63頁。

安詳的孕婦行走在阡陌的村路上，心中對陌生的文化和未知世界充滿渴望。它就像一幅淡遠明淨的鄉村風情畫——俊秀的鄉村媳婦牽着一頭與她一樣懷有身孕的母牛走在趕集的路上，這一畫面凝聚了鄉村世界的悠然、寧靜和美好。田中禾的小說始終表現着健康美好的人性，《姐姐的村庄》里的四兒，《五月》中的改娃，《南風》中的石秀等都是其中的代表，田中禾正是通過描寫具有傳統美德的女性形象來重建人類詩意的心靈家園。劉慶邦表現美好人性和人間關愛的小說被稱為“証美小說”。《梅妞放羊》以詩意而細膩的筆法展現了一個少女的成長歷史。主人公梅妞就像一塊未經雕琢的璞玉，她在與大自然的親昵嬉戲以及對小羊的呵護關愛中漸漸蘇醒了自我的生命意識，並萌發了一種自然的母性情懷。劉慶邦書寫了一種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命狀態和生命之愛。90年代現實主義鄉村小說在對生命意象的書寫中展示了普通農民的生存狀態，以及他們頑強的生命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意志，這類體現生命意識的現實鄉村書寫因此具有了成為90年代經典文本的可能性。

除上述兩種生命形態外，對鄉村生態中健壯活躍生命力的描述也是鄉村文學經典生成的一種方式，但這種生命描寫更多是一種非自然狀態下的虛構真實。作者多以自身對“生命形態”的理解，將鄉村視為原始生命力迸發的場域，追求精神的自由生長，鄉村生態幾乎成為意象的所指。劉恒筆下的“洪水峪”，劉震雲筆下的“馬村”、“申村”都不是真實的鄉村或鄉村的縮影，而是虛擬的所在。“現實的柵欄被虛構拆毀，而想象的野馬被圈入形式的柵欄，結果，文本的真實性中包含着想象的色彩，而想象反過來也包含着真實的成分”。¹⁹⁾另外，鄉村生態中飽含着生活氣息的“溫情”在小說中被一種“荒涼”的寓意所取代。莫言小說改變了“紅高粱系列”以“酒神精神”為寫意表現的浪漫氣質，“荒涼”成為一種獨具個性的修辭。鄉間砸石子的女人們臉上都出現了“一種荒涼的表情，好像寸草不生的鹽鹼地”（《透明的紅蘿卜》）；“一群老百姓面如荒涼的沙漠”（《枯河》）；鄉村燒酒鋪里的男人們“臉上的表情荒涼遙遠，眼

19) [德] 沃尔夫·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陈定家、汪正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第16页。

眉都看不大清楚……”（《球狀閃電》）；即便“狗眼里的神色”也同樣是“遙遠荒涼”（《白狗秋千架》）……上述荒涼的描寫是關於生命想象和生命感覺的體驗。“鄉村”中包含着許多“經典”的想象，現實的鄉村，生存狀態的鄉村，文化意義的鄉村，靈魂栖息的鄉村……從不同層面呈現着或顯或隱、或明或暗的“鄉村生態”景觀。如陳忠實的《白鹿原》記錄了白鹿兩家半個世紀的家族興衰和人世滄桑，作者深入探尋了“故事”背後蘊含的鄉土世界中的人情人性和文化精神。這些小說以鄉村生態的文化內涵為支撐，以各種現代性的手法介入，探討鄉村世界人們的生存方式、思想行為以及生命價值。鄉村生態影像此時更加完整清晰，涵蓋也更豐富多元。一篇篇或清晰明快或晦暗古澀的“故事”占据了90年代大眾的視野，成為具有持久閱讀價值的經典文本。

2) “乡村生态”经典文本的新体验

90年代以來，在新的歷史語境中“鄉村”的生存模式，“農業”的發展道路以及“農民”的思維方式等都迅速告別了傳統的文化生態，生長出歷史催生的諸多新特質。無論採用何種方式，都使世紀末的鄉土小說在敘事視角、敘事場域、敘事精神指向和敘事方式等方面發生了不同於此前鄉土小說的許多變化，由此也產生了“鄉村生態”的經典文本。首先，作家們一方面表現熟悉或頂禮膜拜的“田園牧歌”；另一方面，站在“現代”的價值立場上批判傳統農耕文明給鄉村帶來的苦難和落后。在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迷惘游移在傳統農耕文明與現代工業文明艱難抉擇中的鄉土小說作家們，無論對“傳統”還是對“現代”都有一種迎拒的矛盾之情，他們在這種焦灼中探索和思考中國鄉村生態現代形態的裂變。

其次，城鄉之間的經濟差距日益突顯。農民在城鄉二元對立的體制對話中逐漸失去了平等的發展機遇。鄉土小說家書寫了現代生活轉型中農民的生存狀態和他們靈魂深處的痛苦，揭示出鄉村社會的現實矛盾並予以現實主義的批判。但是，鄉土小說家們作為新成長起來的一批知識分子，他們總以高高在上的

“思想啓蒙”視角，以悲天憫人的姿態書寫農民的現實生存境遇。這種居高臨下却又置身事外的口吻，并未深刻介入農民的現實生存狀態。因此他們的文字雖然也大聲疾呼給予農民生存的平等，但却將苦難之源歸結為鄉村自身的愚昧、狹隘和保守，從而忽視了城鄉對立中分配不均帶來的生存權利和發展機遇的不平等，忽略了鄉村生存狀態的真實面貌和情感力量。在世紀之交的社會觀念轉型時期，中國社會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傳統質朴的鄉村價值觀念開始轉向對權力和金錢的追求。在針對“權”和“錢”對鄉村傳統文明狀態的侵蝕批判中，作家們也存在這樣的一些問題，例如寬宥官員的道德或生活作風問題，沉溺于官場“權術”鬥爭的細致刻畫；將政治制度的某些問題片面轉換為個別權力者的道德操守問題，而弱化現代民主政治理念等。同時，以傳統的道德價值觀念來批判“拜金主義”的思想資源，力度不足；個別情況下全面否定“金錢”價值觀念，片面將“拜金”與鄉村道德體系崩塌聯繫起來，忽視其積極的現代價值性。

再次，面對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危機，90年代以來，鄉村生態小說在揭示人對自然破壞的同時張揚“生態整體主義”的價值觀念。隨着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社會急遽轉型，對自然界的過度開發和利用導致了鄉村土地資源匱乏，生態環境惡化，生態平衡被打破，漫無節制的過度開發必然遭到自然的瘋狂報復甚至危及人類生存，這些問題越來越多地體現在文學作品中。

由上所述，90年代文學對“鄉村生態”進行了新的定義和闡釋，相對於過去鄉村生存或生活形態的紀實小說，它更加注重與“鄉村”關係的原初性、自然性和精神性。它立足于人性面向鄉村自然，其文學觀既蘊含着“天人合一”的傳統倫理價值取向，又兼具了後現代重建自由精神的意圖。90年代以來“鄉村生態小說”由廣義的鄉村生命形態逐漸聚焦於“生態責任、文明批判、生態理想和生態預警”的時代主題和價值取向，鄉村生態創作也逐漸升華至哲學命題的思維高度。以人和自然和諧共處為主題的中國鄉村小說空前活躍，湧現了一大批風格迥異的“生態主題”作品，特別是邊地鄉村系列小說。90年代現代性和後現代性互相滲透的文化語境預示着鄉村文學新時代的到來。這一時期鄉村文學所表

現的鄉村生態的文化內涵更加豐富，鄉村生態圖像也更加多元，進而催生了一批鄉村文學的經典化文本。

3) 經典文本中“鄉村”原生態的退却

二十世紀之交的現代化轉型進程中，城市的身影越來越覆蓋着鄉村的自然山水、田地和風物。鄉村世界既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又在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對峙中出現了各種社會問題。自然生態環境被破壞，鄉村政權變質變味，這使農民的生存、生活狀態發生了史无前例的變化，農民陷入物質與精神的双重困境中。20世紀90年代，中國鄉村中的基本文化形態、經濟生產方式、社會結構以及農民文化心理等方面發生的巨大變化，都在現代化轉型過程的鄉村文學中充分表現出來。它表現的途徑無疑通過鄉村人具體的生活、生存狀態、鄉村的歷史風物、農民進城后的生活狀態和心理等得以反映。90年代中國鄉村社會乃至整個社會結構都處在大時代的重整和變革中，鄉村文學在題材、價值取向和美學形態等方面必然發生新的變化。處于世紀之交的各種文化（包括傳統、現代、後現代）結構和經濟結構相互交融博弈，中國鄉村社會也在現代化的變革中華麗轉身，這些陌生的“鄉村經驗”，拓展了鄉村敘事範疇，也潛移默化地牽動着鄉村敘事策略的變革。因此，長期占據書寫核心的鄉村傳統敘事逐漸拋棄了傳統鄉村的真實面貌，轉向了多元化敘事場域。鄉村生態被隱藏到時代敘事之後，有的成為精神回歸和精神力量象徵的“心靈史”；有的傾向大眾消費文化，將鄉村用“懷舊”進行時尚包裝；還有的在創作方法上進行多種嘗試，出現“詞典體”、“史傳體”、“閒聊體”等。90年代鄉村敘事成為掩藏在“現代”城牆之內的影像，此時城市與鄉村的對立沒有80年代的緊張和膠着，這正是源于多元文化交流中“鄉村生態”的退隱。

人類正破壞着自己的生存資源，科爾沁草原違背了生生不息的自然生存法則，已經變得貧瘠而荒涼。人們必然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人類創造的文明或許被埋沒在荒漠之中。郭雪波《沙狼》中阿木在金嘎達老漢的陪同下尋找曾

經繁華的古城遺迹，但它被風沙掩埋，難覓踪跡。人對自然的肆意破壞和現代文明的不斷拓展使大漠風沙更加肆虐。《大漠狼孩》、《沙葬》、《在毛烏素沙漠南緣》中的一個個小村庄（老哈爾沙村、老黑兒溝村、馬兒庄、一棵樹村等）都被流沙掩埋或正在被掩埋。一系列生態危機使“生態問題”特別是鄉村生態問題被納入新世紀鄉土作家們的敘事視野，也承擔了更多的社會性話語。從“城市融合”的視角，綜合文學領域的幾種敘事角度，90年代以來的鄉土作家們分別做了不同的探索和嘗試。丁帆的《中國鄉土小說史》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鄉村敘事視角分為三類，並指出這與作者的創作立場、思想情感、價值判斷密切相關。90年代處於世紀轉型時期的鄉村世界，是一個雜糅着城鄉沖突、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異變、現代文明與傳統精神交匯的急劇矛盾和多元化的複雜生態空間。由此也產生了新旧文化交替、社會思想混雜的陌生化的“鄉村生態體驗”。作家們形象地為我們展現了農民的生存狀態，在僻遠落后的農村，貧困的生活使農民的精神麻木，耳目閉塞。叶開的《衣錦鄉》、胡學文的《目光似血》在傳統觀念的強烈壓迫下，主人公的生命消逝殆盡，鄉村與現代文明之間的沖突也是作家們關注的焦點。實際上，鄉村是積極向城市中的現代文明靠近的，而城市給予鄉村的排斥和不公也是存在的。

綜上所述，90年代作家們對鄉村文化秩序的重建不斷進行嘗試，但是，鄉村生態的文化多元性決定了文化重建的複雜性。鄉土作家表達的回歸田園的渴望、批判現代文明對鄉村自然的異化現象或是改造鄉土的理念，這些都應以使“人”的栖居地更為詩意、人性更加完善為落腳點，只有基于此，這些話語和價值的傳達才能夠抵達文學最本質的意義和指向。由于90年代文化精神的缺失和知識分子在文化重建中的缺席，90年代的鄉村生態描述具有一種強烈的文化重建的欲望，正是這種嘗試獲得了構建經典文本的勇氣和力量。但由于這種嘗試缺乏與鄉村的溝通與交流，單純的描述和對文化的期盼守望，無法真正找到與鄉村生態溝通的源頭。在面對改革大潮的侵襲時，只能留守最后的回眸——唱一曲無盡的挽歌，之后退守文化障地，而文化重建的目標并未實現。因此，時代的后浪推涌着前浪，關於“鄉村生態”的經典文本不斷被覆蓋、被超越，更替

往矣，循环發展。²⁰⁾

5. 结语

在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中，作家們希望記憶中的鄉村不要變成現代神話中的一片廢墟。因此，文學“經典”伴隨着每一個時代的落音而生成。同時，經典的演繹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不斷重寫“文學史”的過程中，語境的生成和變革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正是“經典是活的，時刻與我們同在”²¹⁾。“五四”時期，“文化啓蒙”與“國民性批判”的審美意識鎖定了鄉土小說為其“載體”。“啓蒙者”以城市視角、西方視角、去反觀“被啓蒙者”（鄉村），在“看”與“被看”、“看戲”與“演戲”的過程中，以“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批判立場，描寫“故鄉世界”，“鄉村生態”與“農民形象”被部分的論據化、例証化、寓意化與符號化，從而轉化成文學構想的時空“寓言體”，其中關涉中國社會、中國文化、民族重建等文學敘事的“寓意”。²²⁾“十七年文學”中，文學經典的生成在於政治話語所確定的“城-鄉”視角。新時期以來，源於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與現代文明規範的重置，以及知識分子創作主體性的恢復，現代意識重新確立在鄉土文學經典的文學之“鄉”的創作中。90年代以來，文學“鄉村”的經典敘事呈現出多元化形式：現實的、浪漫的、魔幻的、先鋒的、後現代的……作為檢驗、追求、反思、質疑現代性的文化“在場”文本的文學“鄉村”，在對“鄉村生態”影像追溯的同時，也嘗試探索文學經典生成的歷史空間和經典繁衍的無限可能性。同時，在對文學經典想象的空間中，也映射出鄉村生態在時代演進中的生態變遷。更符合中國當代文學和當代社會現實的“經典”創作需關注於鄉村世界的心靈和精神、鄉村人物的存在和命運，記敘時代中真實的人性，書寫個體生命的精神和生存狀態，以此尋求中國文學經典的生成與發展。當然，時代的急遽發展，文化的多元向度使鄉土作

20) 賀仲明：〈否定中的潰退與背離：八十年代精神之一種嬗變——以張熒為例〉，《文藝爭鳴》，03期，2000，第31頁。

21) 南帆：〈文學經典、審美與文化權利博奕〉，《學術月刊》，01期，2012，第101頁。

22) 范家進：《現代鄉土小說三家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第31-32頁。

家們在把握現實時顯出一定的思想局限和价值困惑，這些都是時代轉型的必然產物，也記錄了當代作家的精神求索。無論是對現代性的質疑、批判、迎合還是反思，都反映了鄉土作家的願望，即鄉村的日益美好化。

参考文献

- 陈继会,《中国乡土小说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 高玉,〈怀念狼:一种终极关怀〉,《四川大学学报》,05期,2002.
- 古华,《芙蓉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贺仲明,〈否定中的溃退与背离:八十年代精神之一种嬗变——以张炜为例〉,《文艺争鸣》,03期,2000.
-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3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
- 贾平凹,廖增湖,《贾平凹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04期,2000.
- 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4期,2003.
- 南帆,〈文学经典、审美与文化权利博弈〉,《学术月刊》,01期,2012.
- 萨支山,《试论50至70年代“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为中心》,《文学评论》,03期,2001.
- 沈从文,《月下小景》,长沙:岳麓书社,2005.
- 汪名凡,《中国当代小说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 汪曾祺,〈大淖纪事是怎样写出来的〉,《读书》,08期,1982.
- [德]沃尔夫·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陈定家、汪正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 吴秀明、张莉,〈穿越国界和人兽的狼文化写作〉,《外国文学研究》,04期,2008.
- 肖繁,〈真实的可能与狂想的虚假〉,《南方文坛》,02期,2005.
- 叶君,〈乡土·农村·家园·荒野——论中国当代作家的乡村想象〉,《文艺研究》,07期,2006.
- 乐黛云,〈“乡土文学”研究的新收获〉,《中国现代文学丛刊》,02期,1987.

张清华, <野地神话与家园之梦——论张炜近作的农业文化策略>, 《小说评论》, 03期, 1994.

周新民、刘醒龙, <和谐: 当代文学的精神再造——刘醒龙访谈录>, 《小说评论》, 01期, 2007.

Abstract

Generation and Change of Rural Ecological Field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Classic

Zhang Qinfeng, Zhu Ling

The basic creative state and the source of imagination of the rural theme writer derived from the "rural". Here is breed of the possibilities of literary classic generation and limitless imagination. "Rural ecology" as a unique discourse context contains a wealth of semantic space, such as migration experience, poetic writing and life imagination, the time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cenery changes of "rural ecology" also make the gener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classic paradigm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era opportunity and the different survival contexts. We are traced back to the video of "rural ecology", at the same time we try to explore the history space of chinese literary classic generation and the limitless possibilities of classic propagation. There is mapping out ecological changes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times of "rural ecology" in the space of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Key words : Rural ecology, Chinese literary classic, Imagination, Discourse context.

투 고 일 : 2019. 10. 10. / 심 사 일 : 2019. 10. 15. ~ 2019. 11. 15. / 게재확정일 : 2019. 11. 20.